

元人诗序概说^{*}

韩格平

提 要 元人诗序,包括元人撰写的诗前序和以散文形式撰写的介绍相关诗歌创作背景及其内容主旨的诗序文。本文在调查若干元人别集及《全元文》的基础上,择要介绍了元人诗前序与诗序文的基本内容,并以虞集诗序文为例予以简要说明,希望藉此引起学界的关注,且对元代诗歌研究略尽绵力。

关键词 元人诗前序 元人诗序文 虞集诗序文

诗序,指介绍诗歌相关创作背景及其内容主旨的序文。较早的诗序有《毛诗》之大序与小序,其中大序位于全书之首,介绍《诗经》的基本内容与艺术特色,小序则位于各诗之前,介绍该诗的写作缘起。东汉文人诗渐兴,张衡《怨诗》撰有诗前小序。此后曹丕的《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寡妇诗》,曹植的《喜雨诗》、《离友诗三首》亦撰有诗前小序,作者自撰诗序逐渐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较有代表性的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诗前撰有总序,各诗前撰有小序。魏晋时期文人聚会赋诗行乐渐成风气,石崇《金谷诗序》、王羲之《兰亭集序》分别叙述了各自诗酒欢会的情境,内容新颖,文笔洒脱,享誉文坛,且使得诗序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可以脱离其诗文独自流行于世。唐代诗歌大兴,以散文手法撰写独立成篇的诗序亦成为文人的自觉行为。如韩愈即撰有《送陆歙州诗序》、《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荆唱和诗序》、《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石鼎联句诗序》、《郢州溪堂诗序》等。这些序文具有序的文体的基本特征。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序》曰:“《尔雅》云:‘序,绪也。’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①为了与诗前序相区别,我们把这类独立成篇的诗序(含诗集序、诗文集序、诗引等)称作诗序文。这类独立成篇的诗序文在介绍诗作的相关内容的时候,亦多有序文作者对于诗歌创作与审美的主观阐述,它们与各个时期的诗前序一样,是我们研究该时期诗歌创作以及该时期诗风的重要资料。

元代虽年祚较短,但其诗坛繁荣,“近世之为诗者不知其几千百人也,人之为诗者不知其几千百篇也”。^②最近,杨镰先生主编的《全元诗》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全书二

^{*} 本文为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人诗序整理与研究》(11BZW0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2页。

^② 吴澄《张仲默诗序》,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千万字,收入五千二百位诗人,近十四万首诗”。^①清代纂修《全唐诗》,收录“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②两相比较,元代诗坛盛况可见一斑。现存元诗中具有大量诗前序,与之相适应,元代文人撰写独立成篇的诗序文的创作积极性亦颇引人注目。认真阅读这些元人诗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元代诗歌的整体风貌以及元代诗学的独到贡献。

一 元人诗前序管窥

现存元人诗歌虽然数量众多,但是由于年代较久,屡经翻刻传抄,不同版本之间文字出入较大,甚至还有张冠李戴现象。李军教授主编的《元代别集丛刊》收录元代别集二十五种。该《丛刊》注重作品辑佚与版本校勘,内容较为可靠。现取其中十一种别集,将其所收元诗情况列表如下。其中,同题数首诗按一首统计,如刘敏中的《明月上东窗十首》计为一首。

别集名称	诗歌总数	诗前序数	其中超过百字序文数	其中谈及诗歌创作序文数
程鉅夫集	448	14	2	4
胡祇遹集	609	15	7	1
张之翰集	459	9	3	2
刘敏中集	567	62	12	1
刘将孙集	206	9	2	0
戴表元集	615	2	0	0
张养浩集	268	27	3	0
吴师道集	455	6	3	2
欧阳玄集	132	4	2	0
陈基集	556	11	3	0
戴良集	404	11	2	1
合计	4719	170	39	11

就上述十一种别集看,同其诗歌总数相比较,撰有诗前序的诗歌所占比例不大,仅有百分之三点六。作为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前序主要介绍诗歌的咏叹对象或相关创作背景,且大多写得短小明晰,各具特色。例如,胡祇遹《捕蝗行》序曰:“至元六年(1269),北自幽蓟,南抵淮汉,右太行,左东海,皆蝗。朝廷遣使四出掩捕,仆奉命来济南,前后凡百日而绝,故作是诗。”^③时间、事件交待的非常清楚。又如,张养浩《赠刘仲宪》序曰:“仲宪卫州人,以儒掾台省者十余年,清苦如一日,人馈遗皆不受。能诗,喜谈政治,尝谓为天下不自农桑始,三代之盛终不能致。间尝叩之,其言激切,或至泪下。余器其人类古君子,故以诗赠之。”^④简要介绍了刘仲宪之为人,亦为张氏所作的九百余字七言长诗

① 杨镰《元诗文献研究与〈全元诗〉的编纂》,《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5页。

③ 魏崇武、周思成校点《胡祇遹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④ 李鸣、马振奎校点《张养浩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赠刘仲宪》作以铺垫。又如,刘将孙《送王实甫》序曰:“庐陵实甫,垂髫流落,从其母于卤获俘隶之中,卒从卖身得赎,并赎其母以归故乡。然为贫逐食,复奉母,依其所为主于南海上。母遽死焉,可哀也已。因为赋长句,反复古今之痛以慰之。呜呼,实甫!有读吾诗而悲涕者,即有以处吾子于死生患难之间矣。”^①序文简述王实甫身世,亦营造出浓郁的悲伤情境,便于诗文吟咏哀叹。

少数诗前序篇幅较长,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者有意识地导入了议论的内容。例如,刘敏中《送邹平王主簿》序曰:“长民吏之责,其要有三,曰廉,曰公,曰明。盖廉则公,公则明也。备是,然后政理而民不困。然人之情,廉恒难,诱于前,移于中,一失其守,则河决而川逝矣。所谓公与明,何从而得之哉!以是政窳而民益病,古今之通患也。燕山王君仁卿,以耳顺之年,奉九十之母,主邹平县簿。洗手从事,始终五稔,向之三者皆备焉。压于上官而不屈,挠于同列而弗夺,挺然特立,玉洁冰莹,菽水养母,尽其心欢,吏服而民歌之。呜呼!长民如王君,夫岂易得哉!于其将行,诗以赠之。”^②作者首先陈述了“长民吏之责”的廉、公、明三项要点,继而盛赞王仁卿“三者皆备焉”,诗歌主旨鲜明。另一种情况是作者增加了叙事的内容。例如,戴良《平饶信诗》序文详述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江浙行省左丞老平定饶州、信州事,约四百五十字,文多不录。^③又如,欧阳玄《喜闻叶君敬常善政》诗序详述叶敬常修余姚海堤事。“余姚为州,北薄大海,前代筑堤以御海潮,绵亘百四十里……大德辛丑,海水坏堤,自开元至兰风乡三十余里。有司每岁冬调民砮石杙木以为堤,功既卤莽,于事无补,而吏并缘敛民财,岁至十万缗,民甚病之。鄞叶君敬常以胄监公试,初筮为州判官。下车询民疾苦,首以祛民是害为己事。一日集父老而谋之,于是躬相地形,口授经画,务适简便,使民乐从。计税操分,均其长尺,识以揭槩,课功维疆。召匠董公,听其扑认,约以质剂,克期取赏。民各程力,匠自献能,吏奉行文移之外,秋毫无与兹役。三年之间,以石砮堤二千四百四十有四丈。人和力齐,工善材壮,海患永息,民瘼顿苏。斥卤之壤,皆为良田,谷米狼戾……”^④叶恒(字敬常)于后至元四年(1338)重修余姚海堤,时人多有记叙,欧阳玄与其有师生之谊,序文中饱含赞许之意。在上述这些篇幅较长的诗前序文中,吴师道《游仙居南峰》序写的颇有特色,其文曰:

大德十年(1306)秋,余来仙居,闻南峰为登临佳处,而未之识。至是,偕邑人往焉。山去郭数里而近,仰见白塔立云表。踏落叶,缘岭上,空旷极目无际。达兴道寺章安尊者道场,近时邑士吴君直轩讲授寓焉。右偏小轩为临眺之所,群峰拱环,一水回互,寒晖清气,荡溢心目。平沙远村,烟树鱼鸟,如堕潇湘图画中。视轩扁“蓝光”,大字,瘦硬可爱。梁问题郭三益、杨宗山、刘明府、陈古灵先生诗。在旁有近人《登高怀古》词,亦悲壮。时众客互觞喧哗,余独操片纸吮笔,视佳者记之。癖好类如此。客有导余循东庑,拂尘壁,读陈仁玉拟骚词。陈风流文翰,邑名宦,喜觞咏山水间。尝规轩前小阜营葬穴,今其后弃不复葬,悉为势家有。客感旧故,叹息不已,余亦怆然。既而曰:“人生良会,开口一笑不易得,今古兴废事,奚足介哉!”于是举酒相属,乐甚。

① 李鸣、沈静校点《刘将孙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② 邓瑞全、谢辉校点《刘敏中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

③ 参见李军、施贤明校点《戴良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④ 魏崇武、刘建立校点《欧阳玄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页。

顾日欲暮,半醉而罢。余闻天下奇观,往往因文人胜士题咏发之。今南峰溪山甚佳,留题甚多。古灵不可尚也,如郭三益诗亦清丽,惜乎传诵者少,而南峰之胜不得附之以显也。兹游不欲作诗,客请焉。倚歌和之,非求多之也,庶将著其诗,而广传好事者耳。^①

序文为记叙作者登临仙居县南峰游览赋诗而作,文思平易坦然,文笔质直流畅,读之颇类游记。只是该诗正文为七言律诗,长篇序文似有“喧宾夺主”之嫌。值得注意的是,彭堃《改都名诗序》、戴良《云深诗序》、虞集《送熊太古诗序》等亦为长序附带短诗,不过,三者均题为“诗序”且归属序体,看来元人对于长序附带短诗之作的文体归属尚有分歧。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诗前序中,未见关于诗歌创作与诗歌欣赏等诗学理论的论述。即便少数谈及时人诗歌创作,也仅仅是一般性的介绍,如上引吴师道《游仙居南峰》序所云郭三益、陈古灵之诗。又如,程钜夫《次韵赵方塘》序曰:“绩雨为沴,方塘待制出长篇讼风伯,忧爱之诚溢乎笔墨之外,不鄙赐教。顾某何足以知此耶?厚意不可虚辱,辄次韵,一资捧腹。”^②赵与黑字晦叔,号方塘,宋宗室子。至元十三年(1276),召至上京,元世祖忽必烈授以翰林待制,为人“忠言说论,无所顾惜”,卒时“家贫无以为葬”,事见《元史》本传。程序称赵诗“忧爱之诚溢乎笔墨之外”,主要是在誉人。

二 元人诗序文简介

元人诗序文涉及的内容比较宽泛,既有为其友人的诗集、诗文集、诗卷撰写的序文,亦有为文人们共同创作的送别诗、鉴赏诗、庆寿诗、宴集诗、节妇诗、孝子诗、哀挽诗等撰写的序文。据我们查阅《全元文》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共有三百余位元代文人撰有近二千篇诗序文(尚有五百余篇与诗歌创作相关的跋文、题记未统计在内),总文字量在百万以上。其中,撰写诗序文二十篇以上的作者如下:

王义山 23 篇	王恽 26 篇	方回 58 篇	何梦桂 59 篇	张之翰 21 篇
戴表元 53 篇	吴澄 120 篇	程钜夫 21 篇	刘将孙 20 篇	袁桷 23 篇
虞集 76 篇	黄溍 46 篇	欧阳玄 23 篇	陈旅 23 篇	许有壬 28 篇
杨维桢 56 篇	李祁 27 篇	危素 28 篇	陈基 36 篇	朱善 24 篇
戴良 30 篇	刘楚 31 篇	王沂 29 篇	王礼 32 篇	

作为独立成篇的诗序文,其基本内容与诗前序稍有不同。其一,诗前序乃作者为自己创作的诗歌作序,诗序文则主要是作者为他人创作的诗歌作序,故文中需要使用较大篇幅详细地介绍诗歌作者及其相关背景。例如,虞集《黄纯宗遗诗序》,是为崇仁黄炎(字纯宗)诸孙黄介寿刊刻乃祖遗诗而作,序文介绍了黄炎宋末元初的操行事迹,“知之悉而言之详”。^③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序文是我们研究元代诗人及其创作背景的重要资料。其二,诗前序的内容一般仅限于本诗,诗序文的内容则往往涉及多篇诗歌,故文中需要从诗歌创作与欣赏等诗学理论入手,对所序之作加以归纳概括。如舒岳祥《刘士元诗序》曰:“诗贵成,成贵专……诗者,言之最精也,而可以不专者能之乎?予与刘君士元卿月居同

① 邱居里、邢新欣校点《吴师道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② 张文澍校点《程钜夫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

③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里,知其力于吟甚。又其所作,如平林远水,翳然幽蔚,致有佳趣,岂非专且成者乎……”^①既指出刘士元诗歌“如平林远水,翳然幽蔚,致有佳趣”的艺术特色,又称赞其诗歌已经达到“专且成者”的高度。另外,该序还谈到了石城王与义、冰壑王惟明、阆风刘培之、南峡胡蜚英,以及刘士元之弟刘湘这些“宁海诗流”。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序文亦是我们研究元代诗学及诗歌史的重要资料。有关元人诗序文的具体情况,我们以虞集的作品为例,稍加介绍。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邵庵。元代中期著名文人,与杨载、范梈、揭傒斯并称“元诗四大家”,又与揭傒斯、柳贯、黄溍并称“儒林四杰”,又与姚燧并称“元文两家”,诗文存世甚多,有诗序文七十六篇(另有文集序七篇,诗跋、诗题记十六篇)。

首先,虞集撰有二十六篇反映送行、庆寿、宴酬、纪游、纪孝、纪功等内容诗歌的诗序文。这些诗歌涉及了作者生活的不同侧面,其中,《送达溥化兼善赴南台御史诗序》、《送苏子宁北行诗序》、《送李道济之官夷陵诗序》、《送李亨赴广州教授诗序》属于官场酬答之作,亦颇有告诫勉励之语。《送宪部张乐明还海东诗序》,张乐明为高丽使臣,为“请善医”而来,序文可作当时高丽国与元帝国“甥舅之好”的左证。《送昌上人诗序》(《全元文》第26册,第247页)赞誉了僧人鄮山昌上人振兴禅宗的种种努力,也暴露了“近世奉佛,号称极盛,而名山大刹之间,或阴坏其法”的弊端。《诏使祷雨诗序》、《阳曲义士薛氏诗序》分别涉及了陕西比岁饥旱与晋宁饥荒尤甚的社会现实,作者关心民生之情充盈字里行间。较能展示虞集为官心态的,有《游长春宫诗序》(《全元文》第26册,第218页),大德八年(1304),虞集三十三岁,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已经二年。作为宋丞相虞允文的五世孙,面对燕城废址,虞集颇有“感慨于陈迹”之叹。文中自喻“幽人奇士”,将其欲言而又难言之意展露无遗。可以说,这种深植于作者内心深处的“眷宋”之情,一直伴随其此后四十余年的馆阁及归隐生活之中。

其次,虞集为九部诗歌总集撰有序文。这九部总集中,涉及元人编辑、翻刻前代作品的三部,即西夏人斡玉伦徒(字克庄)在闽翻刻的《郑氏毛诗》,襄城杨士弘(字伯谦)所选唐诗总集《唐音》,豫章左克明所选汉魏至中古的诗歌总集《新编古乐府》,其中,《唐音》与《新编古乐府》今有存本。虞集在序文中热情赞誉了三位翻刻、编纂者的学术举措,同时,在《郑氏毛诗序》中谈及自己研读《诗经》的体会,且推崇朱熹《诗集传》之说。另外六部为元代诗歌总集。其中,《龙飞亭诗集》为众臣歌颂文宗皇帝昔游之亭的诗歌集,《梅庭诗》为众宾客为梅庭主人江右宪使李重山赋诗之总集,虞集为二者作序,颇有官场应酬的意味。至于建阳蒋易(字师文)编辑的《国朝风雅》三十卷,清江傅习(字说卿)采集、庐陵孙存吾选次的《元风雅》,葛存吾采集的《蜀诗》,高万里所选“近代至今日之诗”而成的《朔南风雅》(前二部今有存本),均由个人之力所为。如《葛生新采蜀诗序》(《全元文》第26册,第108页)云:“(葛存吾)乃沿豫章,泛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汉之波,遂遡三峡,至于蜀都而止焉。求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数年,得诗六百余篇”,颇为不易。对这些诗集,虞集序文从展示“国家声文之盛”(《国朝风雅序》)的高度予以充分的肯定。另外,《国朝风雅》“以保定刘静修先生为之首”,《元风雅》亦“以静修先生刘梦吉为之首”,虞集赞同这样的做法。“若刘先生之高识卓行,诚为中州诸君子之冠”(《国朝风雅序》,《全元文》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册,第238页。

第26册,第95页)，“若刘公之高识远志，人品英迈，卓然不可企及，冠冕斯文，固为得之”(《元风雅原序》，《全元文》第26册，第135页)。又曰“予观于国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学者，高明坚勇，孰有过于静修者哉？”(《安敬仲文集序》，《全元文》第26册，第98页)刘因字梦吉，号静修，有自选诗《丁亥集》五卷，元人多有称誉。

第三，虞集为四十一部诗集(含诗文集)撰有序文。其中，《道园天藻诗稿序》(《全元文》第26册，第128页)乃作者为自撰诗集所作，自谓平生作诗，“随事酬应，非有所著述”，“咏歌以还，无复留贮”，而本诗集“则清江黄思谦志高之所掇拾也”。又有四篇序文是为元人编辑唐宋诗集而作，其中有曹南吴主一的《新刊杜工部诗类》与申屠致远的《杜诗纂例》，虞集在肯定二者编纂之功的同时，高度赞誉了杜甫的诗歌成就。“子美特起，遂为诗家之宗。旷达之高，感慨之极，情性之至，志节之大，当时诸人盖莫之备焉。”(《新刊杜工部诗类序》，《全元文》第26册，第94页)其余三十六篇序文，则均为元人诗集而作，详目如下：

胡师远诗集△▲	李京《鸿巢漫稿》▲	安熙《默庵集》
焦养直《彝斋存稿》▲	曹伯启《汉泉漫稿》	易南甫诗集△▲
刘桂隐存稿△▲	陈思济诗集▲	李进《礪谷居愧稿》▲
熊本《旧雨集》▲	溪山《渔樵问对》△▲①	饶敬仲诗集▲
黄纯宗遗诗集△▲	杨益《随斋诗集》▲	王茂实《清溪山房诗集》△▲
刘沙刺班《学斋吟藁》▲	僧嘉讷《崱山诗集》△▲	司执中《西游漫藁》△▲
吴和叔诗集▲	溥仲渊《笙鹤清音》△▲	谢坚白诗集△▲
朱望幼《乐吾愚诗集》△▲	耿介《应言藁》△▲	李源道《宗雅》▲
杨叔能诗集△▲	杨贤可诗集▲	曾德裕《小轩集》▲
会上人诗集△▲	朱思本《贞一藁》	张清夫诗集▲
刘彦行诗集△▲	吴绶祖母黄夫人《贞节集》△▲	傅与砺诗集
释大欣《蒲室集》	周伯琦《近光集》	尹廷高《玉井樵唱续集》

(说明：有△者为其人未见《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有▲者为其诗集今已不存。)

在上述三十六种诗集中，作者未见于王德毅等人编著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者十六人，诗集今已不存者二十九种，据此，可以略见虞集其时诗歌创作之繁盛、诗歌作者之普及，亦使今人为元诗散佚之严重深感遗憾。研读上述序文，有助于我们了解诗集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概况，其中，虞集诗集序文亦有可以裨补《元史》者。例如，《焦文靖公彝斋存稿序》为一长篇序文，叙述焦养直(字无咎，谥文靖，自号集斋)生平，远较《元史》本传为详。十余年后，虞集撰《焦文靖公神道碑》，则又有所补充。若选虞集诗序文的代表作，当取《傅与砺诗集序》，其文云：

诗之为学，盛于汉魏者，三曹七子，至于诸谢侔矣。唐人诸体之作，与代终始，而李、杜为正宗。子美论太白，比之阴常侍、庾开府、鲍参军，极其风流之所至，赞咏之意远矣。浅浅者，未足以知子美之所以为言也。崔颢人品非雅驯，太白见其《黄鹤》之篇，自以为不可及，至金陵而后彷徨焉。其高怀慕尚如此，谁谓其恃才傲物者乎！求诸子美之所自谓，盛称《文选》而远师苏、李。咏歌之不足者，王右丞、孟浩然，而所与

① 《渔樵问对》的作者为“溪山翁”，乃虞集“中表父兄”。查虞集有夫人刘氏，疑此指刘一飞，字景翔，号溪山，待讨。

者,岑参、高适,实相羽翼。后之学杜者多矣,有能旁求其所以自致自得者乎?是以前宋之盛,亦有所不逮矣。国初,中州袭赵礼部、元裕之之遗风,宗尚眉山之体。至涿郡卢公,稍变其法,始以诗名,东南宋季衰陋之气,亦已销尽。大德中,文章辈出,赫然鸣其治平。集所与游者亦众,而贫寒相望,发明斯事者,则浦城杨仲弘、江右范德机其人也。杨之合作,吴兴赵公最先知之。而德机之高古神妙,诸君子未有不许之者也。其后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远,亦自成一家,观者无间言。而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而与前之诸公,先后沦逝,识者然后知其不可复得也。德机之里人傅君与砺,始以布衣至京师。数日之间,词章传诵,名胜之士无不倒屣而迎之,以为上客。台省馆阁以文名者,称之无异辞。岂非以其风韵,足以及于予所道诸君也哉!予去国十年,与砺自交趾使还,以家贫亲老,授南海文学以归。嗟夫!上林千树,岂无一枝以栖朝阳之羽哉?而一官岭海之不厌,何也?前数年,诸公相知者多散出于外。今明良一廷,无所忌讳,清涧之蒲,海湾之水,不足以久烦吟咏也必矣。书其别后稿如此。迟其北还,则沉郁顿挫,从容温厚,有可起予者,何幸于余生亲见之哉?作傅君与砺《使还新稿序》。至正辛巳(1341)六月朔,虞集伯生序。^①

傅若金(1303~1342),字与砺,“赋质清美,自幼为诗,出语惊人”,“学长于毛氏《诗》,尤喜汉、魏、盛唐诸作,其诗数百篇,多可传诵”。^②有《牛铎音》(范梈作序)、《初稿》、《南征稿》(揭傒斯作序)、《使还新稿》(虞集作序)等。虞集序文将傅若金与“予所道诸君”相提并论,而“上林千树,岂无一枝以栖朝阳之羽哉”一语,则是对其南使安南、任职广州所发的感慨。序文平直简明且饱含真情,符合虞氏文风。

纵观虞集三十六篇诗集序,主要谈了两方面内容。其一,评论前人及时人的诗歌创作。

虞集诗序每每谈及前代诗人,上引《傅与砺诗集序》从汉魏、三曹七子,述及唐人、今人,即是一例。又如,《杨叔能诗序》(《全元文》第26册,第224页)曰:“吾尝以此求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则陶处士、王右丞、韦苏州、柳子厚其人也。苏州学诗于憔悴之余,子厚精思于窜谪之久,然后世虑消歇,得发其过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宽闲寂寞之地,盖有怨创困绝,而后至于斯也。右丞冲澹,何愧于昔人。然而一旦患难之来,遽失所守,是有余于闲适,不足于事变,良可叹也。必也大义所存,立志不贰,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处士者,其知道之言乎!”元人评诗,大多推崇陶渊明,虞集亦然。

“前宋之盛,亦有所不逮”,是虞集诸篇诗序文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多次评论宋人诗作。“盖宋人尚进士业,诗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来,若陈简斋参政、方翁陆公、诚斋杨公,擅名当世。及其季年,若曾苍山、赵东林,盖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指李进)诗真率调畅,简散深至,兼诸子之长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乐天知命、安于所遇者,可谓感慨系之矣。”(《礪谷居愧稿序》,《全元文》第26册,第116页)李进字野翁,宋淳祐四年进士,仕至朝奉郎,福建运管,入元不仕,隐居县东门之外,自题其舍曰“礪谷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6册,第265页。刘真伦先生认为本序文“疑点甚多”,详见其论文《陈垣先生〈萨都刺疑年〉补证》,《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38页。

^② 苏天爵《元故广州路儒学教授傅君墓志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0册,第415页。

居”种瓜植菊以终其身。需要指出的是,虞集对于宋诗多有微词,较为激烈的批评言辞见于《玉井樵唱集序》(《全元文》第26册,第274页)，“当先宋之季年,谈义理者以讲说为诗,事科举者以程文为诗。或杂出于庄周瞿聃之言以为高,或下取于市井俳优之说以为达。江湖之间,草茅之士,叫号以为豪;纨绔之子,珠履之客,靡丽以为雅。世不复有诗矣。”

相比较,虞集对于元代诗人则多赞美之词。如《吴和叔诗序》(《全元文》第26册,第134页)曰:“盖和叔之为诗,其音节平和而不暴于气,其理致详而不汨于时。喜而乐也不至于放,哀而怒也不至于伤。从容于日用酬酢之间,萧散于尘壒游埃之外。生乎承平之时,无前代子美之穷愁;安乎所遇之常,有近时放翁之优逸,其真能言者哉!”吴礼字和叔,曾任江西省掾,清人顾嗣立称其“嗜读史吟诗,为吏有操行,虽簿书丛中,不废吟事,故其词婉熟”。^①上述三十六篇诗集序大多注意到作者的人品与诗风。当然,其中亦偶有官场逢迎之作。如为广东元帅僧嘉讷所撰《崢山诗集序》,誉语空泛,不足称道。需要提及的是,虞集与僧人、道士多有交往,对其诗作亦往往赞誉有加。如《会上人诗序》(《全元文》第26册,第248页)曰:“浮图氏之入中国也,不以立言语文字为宗,于诗乎何有?然以其超诣特卓之见,撙节隐括以为辞,固有浩博宏达大过于人者,则固诗之别出者也。……予过吴,遇钱塘会上人,以其诗数百篇示余。盖其毕生深得禅悦之味,枯槁介特,绝不与世相婴。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与之接也。而独得其一绪之清思,终日累月,咍哦讽咏于泉石几榻之间,其运思苦,造言精矣。”会上人擅长作诗,赵孟頫亦叹其诗有味道,只是其人事迹不详,据虞集之序可以略知一二。

其二,阐述自己的诗学主张。“诗之为学”,亦是虞集诸篇诗序文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首先,虞集反复强调了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古者君臣赓歌于朝以相劝戒,颂德作乐以荐于天地宗庙。朝觐宴享之合,征伐勉劳之恩,建国设都之役,车马田猎之盛,农畝艰难之业,闺门和乐之善,悉托于诗,而其用大矣。至于亡国失家,放臣逐子、嫠妇怨女之感,淫渎馋刺之起,而其变极矣。于是又有隐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谣诵讖纬之文,史传物色之咏,神仙术数之说,鬼神幽怪之语,其类尚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则发诸音而成文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者也。”(《会上人诗序》,《全元文》第26册,第248页)“诗也者,言之至精而声之至谐者也。”(《玉井樵唱集序》,《全元文》第26册,第274页)虞集所云“垂世立教”,本于儒家诗教之说,亦为其诗学主张的立论基础。

其次,虞集强调作诗者需得“情性之正”,注重个人的品行修养。“盖必有托兴于吟咏,纪事于篇章,则其志之所存,行之所及,人材时务得失远近,可得而观焉,是以诗之不可无也。然而不本于学问以为言,则无补于治化之实;不察乎感发之私意,则有乖乎情性之正,盖亦无取焉。”(《杨随斋诗集序》,《全元文》第26册,第125页)“是以无长歌之纤徐,短咏之激烈,无以陈说其志意,而感动其性情。”(《陈文肃公诗集序》,《全元文》第26册,第113页)而刘沙刺班诗作之所以受到虞集赞誉,亦在于其诗“发感慨于情性之正,存忧患于敦厚之言,是为不可及者。”(《刘公伯温学斋吟稿序》,《全元文》第26册,第131页)然而,“后世诗人,深于怨者多工,长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归,极放浪者不能有所返,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虑安静,最为近之。然学有以致其道,思所以达

^① 《元诗选》癸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21页。

其才,庶几古诗人作者之能事乎”(《盱江胡师远诗集序》,《全元文》第26册,第72页)“昔者先王之泽及人也深,虽井里之远,闺阃之奥,皆有以得其情性之正。或处安乐之常,或遭患难之变。哀乐异情,言之所发,因其所遇,无所矫饰,一出礼义而无违,诗之存乎《国风》者可知矣。”(《贞节集序》,《全元文》第26册,第264页)在虞集看来,诗歌是宣发个人性情的重要媒介。“学有以致其道,思所以达其才”,方能成为真正的诗人。这样的诗人,“美质而笃”,“嗜欲淡泊,思虑安静”,而深于怨者、长于情者、善感慨者、极放浪者虽亦能诗,但皆非得情性之正。正如虞集《与赵伯高论诗》诗所云:“莫道幽人有意吟,缘情生变苦推寻。奇云映日书成字,灵响盘空谱作音。春风融融天广大,秋蛩唧唧雨阴沉。性情平淡随时见,礼乐何曾系古今。”^①“性情平淡”可以视为“情性之正”的表现之一。强调诗人及其诗歌作品的“情性之正”,有助于规范诗歌的基本内容与情调。

再次,虞集以水为喻,评价具体的诗人及其作品。“夫君子之为学,常因美质而笃焉。师远诗思之清,可谓美矣。然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行如山之固,而确然不可移;育德者,其涵养如水之达,而沛然无不济。故水非徒清之谓也。”(《盱江胡师远诗集序》)虞集以水为喻,既赞美其清,又赞美“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非徒清之谓也”,用清且具有多种功用之水喻诗人之诗品与诗才。类似之喻,亦见于其它诗序文。

而后之论者,乃以为平和之辞难美,忧愤之言易工,是直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为言耳。盍亦观于水夫?安流无波,演迤万里,其深长岂易穷也。若夫风涛惊奔,洄石险壮,是特其遇物之极于变者,而曰水之奇观必在于是,岂观水之术也哉?余读景山之诗而有感于此矣……二十年间,为诗凡数百篇,而云南诸作,尤为世所传诵,岂非感激于其变者然哉?……虽能悲宕动人,察其意,则能深省顺处,无怨尤忿厉之气。其居乡之作,放旷平易,又若初未始更忧乐之变者。余因历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有以见其所存者,庶几不缪于古之人矣。而徒以云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尽窥景山者也。(《李景山诗集序》,《全元文》第26册,第97页)

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为惊涛巨浪之壮,或为平波漫流之闲,一洼之盈,一曲之胜,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观者焉,以水之同出一原故也。故善赋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余之兴,随所寓而有所焉,何患乎众体之不皆妙也?固也,予昔之言诗乎?(《易南甫诗序》,《全元文》第26册,第109页)

可以说,深悟于水清之本与水行之用,并将其形象地运用于诗歌美感的描述与诗歌创作的阐释,是虞集诗学主张的一大特色,当然,亦符合虞集个人为人处世的性格特征。归纳、分析虞集的上述诗学主张,有助于我们深入研读虞集个人的诗歌作品,有助于我们在比较其他诗人诗学主张的基础上,更好地评价元诗创作与元代诗学。

总之,就我们对于元人诗序的初步研读看,元人诗序内涵丰富,有待于予以全面整理与研究。我们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亦期待得到方家师长的批评指正。

(作者通讯地址:韩格平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100875)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道园类稿》卷8,《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5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63页。